

保罗·德·曼语言理论中的“物质性”^{*}

岳国法

(郑州大学, 郑州 450001)

摘要: “物质性”是保罗·德·曼语言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仅是铭写的基质,也是实现从隐性向显性转换的重要因子,还在描写历史的过程中导致历史认知与物理现实之间的偏离。在审美过程中,物质性视野更有助于启发我们去发现意义构成的要素及其构成的复杂性。

关键词: 保罗·德·曼; 语言; 物质性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8)04-0007-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8.04.002

“Materiality” in Paul de Man’s Theory of Language

Yue Guo-fa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Material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s in Paul de Man’s theory of language. As the matrix of inscription, it not only is the significant meaning element in realizing the changing from the implicit to the explicit, but also leads to the aberrant of historical cognition from physical reality in the process of depicting history. During the aesthetic process, material vision is much helpful to enlighten us on the discovery of the elements of meaning and the complexity of its construction.

Key words: Paul de Man; language; materiality

1 引言

保罗·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是美国著名的解构主义论者,他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地位堪与雅克·德里达比肩。德·曼的学术论文中反复出现“物质”一词,但较少引起评论者们的注意,如“物质性的视野”“语言的字面和物质方面”“实际历史的物质性”“康德的现象性和物质性”“思想的感官表现作为名字的物质铭写”“符号的理论以物质的方式显示自身”(de Man 1996: 102-103),“能指的物质性和它所指事物的物质性”(同上 1986: 11)。评论界通常将“物质”“物质主义”“物质性”这一类词语与文化批评、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联系起来,涉及意识形态、文学的社会性等方面。然而,德·曼作为一个文本主义者,认为“考虑作家实际的、历史的存在,从批评的角度看是浪费时间”(同上 1983: 35)。国

外也有学者把德·曼的物质性定义为一种“没有实质的物质性”(Cohen 2001: vii)。那么,“物质性”在德·曼的论文中指什么?基于此,本文拟从铭写(Inscription)、历史和审美3个层面,探讨德·曼语言理论中“物质性”作为一个重要的意义因子对于文本阐释的作用和意义。

2 铭写的物质性

德·曼关于铭写物质性的讨论主要出现在关于米歇尔·里法泰尔(Michael Riffaterre)和索绪尔的书写论中。根据里法泰尔的《诗歌符号学》(*Semiotics of Poetry*),任何文本下都有一个潜在的文本存在着,从隐性向显性的转换过程中,基质(matrix)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作为一个既定的潜在结构,是显性意义完整性的前提。但是,“基质是假定的,只是作为一种结构在语法和词汇方面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保罗·德·曼语言理论的认识论研究”(15BWW001)的阶段性成果。湖南大学谭琼琳教授为本文修改提出建设性意见,特此感谢。

的实现”有待于读者从中发现意义生成的可能性 (Riffaterre 1978: 19)。德·曼据此评价,里法泰尔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潜藏书写”(hypogram)以及如何“把潜藏书写转化成文本的规则”(de Man 1986: 39),认为这个问题是对索绪尔“易位书写”(anagram)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

例如,Taurasia Cisauna Samnio cepit这句拉丁文诗歌中,ci + pi + io再加Samnio cepit中的S,就构成古罗马时期Scipio(西庇阿)家族里的名字。换言之,诗人把人的名字暗含于诗歌中,读者需要找出已经被改换顺序的字母重新进行整合,才能发现诗人想要表达的意义。索绪尔在《词语之上的词语》(Words upon Words)中称之为“易位书写”,即词汇的顺序改变与书写中内置的意义组合存在很大关系,而且这种组合是诗歌创作的意义因子,它“以易位书写为基础,并为之所主导”(Starobinski 1979: 16 - 17)。索绪尔后来又以hypogram替代anagram,因为前者“能更好地指出所要特指的东西”,它“强调一个名字、一个词语,通过重复音节指出重点,进而以这种方法产生一个二级的、设计出来的意义,附于词语的最初的意义上”(同上: 17 - 18)。Anagram和hypogram都使用后缀-gram,这个词缀来自希腊语的graphy(= letter,字母)即书写,其关键是要证明:词语都有一个专属的书写,以原初性形式潜藏于文本内,不管语言的能指如何变换,其所指的意义一直保持不变。

索绪尔和里法泰尔的书写论对于意义论的影响,与后结构主义语言论中的语言游戏思路大概一致,其共性都在于把书写看作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的符号结构断裂和意义不确定性的证据,具有特殊的文本生产能力。语言的能指之间通过易位书写的形式,以不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产生新的意义。

索绪尔注意到语言的物质性问题,他承认语言符号中“声音模式”相对于“概念”来说,“可以叫做‘物质’的成分,因为它是我们感官印象的表述”,但他却拒绝承认书写的积极意义,认为书写的物质性会影响语言交流的透明性,书写形式存在的唯一原因是为了语言符号体系,而且“书写会模糊我们的语言观”(Saussure 2001: 66, 29)。“书写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假装。”(同上: 29)德里达把这种观点归为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有的对书写的偏见,把书写视为第二性的交流系统,“受限于语音书写的模式和语言中的词语”(Derrida 1997: 30)。但是,索绪尔对书写的研

究,恰如德·曼所说,让我们看到对语言现象性的拆解,“对认知的拆解以及无法控制的作为铭写的文字的替代”(de Man 1986: 37)。

事实上,索绪尔和里法泰尔的书写论背后隐含一种转义论。Hypogram来自希腊语hypographēin(面具或脸),暗指最初的词语具有稳定的意义,但却会被潜藏的书写改变,而且最初的词义或将消失,渐渐形成一个新的词语;这个通过转义获得的词语,就成为命名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客体的词语。因此,潜藏书写从一开始就与转义相关。所显现的物质性即为铭写的物质性,对它的描述其实是一种掩饰铭写的方法和手段。在德·曼眼里,“铭写既不是形象,不是符号,不是认知,也不是欲望,不是潜藏书写,不是基质。如果只是以一种形象化的逃离,即以巧妙而有效地逃离形式的形式,来回应它的能力,那么任何阅读理论或诗学理论都无法到达一致”(同上: 51)。

德·曼关于铭写物质性的论述还出现在关于本雅明(William Benjamin)的翻译论中。本雅明认为,“译者的任务在于,发现意图对于他正在翻译成的语言的影响,这种意图会在翻译中引出原著的回声”(Benjamin 2007: 76)。然而,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过程中,异质语言之间在词语、句子和结构上会有很大不同且相互排斥,因此,译者必须发现异质语言之间的关系,即潜存于每种语言之下作为一个整体的意图中的“纯语言”——一种“不再意指或表达任何东西,而是一种无表现的、创造性的词语”(同上: 80)。德·曼赞同本雅明关于纯语言的论述,认为语言的不可译性表现在文字与意义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二者的关系充分体现出语法和意义之间的不相容性。例如,当拼写一个单词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出一些毫无意义的字母,这些字母聚在一起便构成一个词,但词的意义又不会出现在每一个字母上。就像water的意义并不来自于各个组成字母如w-a-t-e-r,整个单词water的意义来自于这个词的整体,是完全独立的,意义与字母毫无关系。同理,词语与句子之间的关系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翻译只是字面词语的翻译,那么整个句子的意义就消失了。换言之,在翻译的过程中,词语之间的语法结构并不能完全控制意义的表现,因此也就造成意义的不可译性。这种语法和意义之间的断裂造成的不可译,就在于“文字的物质性、独立性,以及通过引入滑移来破坏具有明显稳定意义的句子的方法,而这种滑移使得意义消失、逃离,也由此使对意义的控制完全消失”(de Man 1986:

89)。

德·曼关于语法和意义的论述,说明了意义并不依赖于某个词。这必然导致一个断裂,即一个转义后的虚构整体与一个转义的确已经达到一个目的之间出现的自我解构。“虚构的整体”即我们通常认为的实在(reality),而德·曼认为这个所谓的“实在”,属于语言运用的普遍性错误倾向,使得意义无法认知,只是体验、经历句子中所有词共同构成的整体转义。因此,翻译无法穷尽文本,文本总会不同于我们的翻译,抵制我们的任何同化。正如德·曼所评价的,“在本雅明看来,语言是一种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功能的、纯粹的能指,没有任何语义功能,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性的语言学语言”(同上:96-97)。译者翻译时,是将与语言有关的一切东西,例如意向、情感,都带入翻译的过程中,而这个被带入的东西,就是“物质性”,它潜在地内置于语言之内。翻译会显示出“在意向去命名一个事物与这个事物的单词自身的物质性之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差异”(同上:87)。

由此可知,德·曼是以另一种方式探讨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语言自身是物质性的,我们使用的语言决定我们对真实世界的经验,即欲感受世界,必先感受语言。铭写物质性的研究意义在于:语言作为概念存在,这两者之间的断裂或空隙是逻各斯和字面意义掩盖的、消除的。我们只是经历语言的物质性,而不是世界。

3 历史的物质性

德·曼对历史物质性的讨论是在语言物质性的基础上展开的,正如他在《康德与席勒》(“Kant and Schiller”)一文中指出的,历史“与时空没有关系,而是来自语言认知的一种语言能力的体现”(同上1996:133)。那么,德·曼从语言的角度审视历史,在研究方法和意义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其物质性又在哪些方面表现为语言能力呢。

第一,历史表现为语言事件。德·曼认为,“历史不是人文的,因为它与语言的顺序紧密相关;它也不是自然的,这是基于同一个原因;它也不是现象学的,关于人的认知和知识无法从历史中获得,因为历史本身就有一种纯粹的语言复杂性;它也不是时间性的,因为产生它的结构不是一个时间结构”(同上1986:92)。在这段表述中,“历史”作为一个叙述实体,被附加上各种属性:“非人文性”让历史分析避开传统的社会学思路。“非自然性”让历史分析不能像自然进程那样做

类比推论,或者说不能把历史看作一种有机的成长或者辩证的发展,因为自然的、有机的分析属于“黑格尔式的”论证模式,即习惯于把语言形式与所指物对应起来(同上1996:92)。这种思维定式上的不足就在于把历史的物质性降低为一种历史事实。例如,在分析哲学与历史、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时,德·曼认为,对任何事物的历时阶段的划分都是历史的偶然性与思想表述的必然性之间的断裂,而事实上我们应将二者的关系倒置过来,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自然进程的改变。“非现象学”和“非时间性”则从研究方法上把历史从时空范畴中拉出来,置于复杂的语言结构中,进一步拒绝历史的有机论,恰如德·曼认为的,“历史不能被认为是进步的或者退步的,而是事件,发生的事”(同上:133)。

德·曼将历史定义为事件,与语言紧密相关,是在语言与其他符号的交互作用下才产生的。这个观点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论述较为相似。怀特认为,历史中发生的事件如果按照不同的隐喻模式来理解,就会出现不同的语言效果,根本没有我们期盼的客观真实的历史,任何历史的呈现都可以归结为历史书写者的一种想象,而这种想象“体现在历史作品的语言之中”(怀特2003:44)。对比可知,二者都从语言的角度来理解历史,拒绝将历史看作一种物理现实,提倡以语言知识的形态来审视历史。历史的物质性,作为一种非纯粹客观性的存在,是由历史书写者的主体意识决定的。作为事件的历史,只是一种认知,必然呈现出某种主观性和相对性。不同之处在于,德·曼在定义历史的同时,更强调历史从物理现实向语言事件转换过程中,由于语言物质性的复杂性和语言的隐喻性认识过程把历史的物质性过程个体化,促成历史认知与物质事实的偏离。

第二,历史表现为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历史作为物理现实不可能直接显现出来,这个观点早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有论及,“即使从一开始也不是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的,‘精神’(mind)注定要受折磨,要受到物质的‘拖累’(burdened),这里的物质是以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以语言的形式来表现着”(Marx 1998:34)。马克思认为,存在的物质性必然反映在语言形式的物质性之内,而语言形式的物质又必然作用于人的主观意识。在存在与意识之间,语言的中介作用从本质上否定人的意识是对存在的直接反映。为此,德·曼提出,处理意识形态的问题必须先解决语言的问题,否则就会成为“肤

浅的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读者”(de Man 1983: 11)。

语言的不及物性是架设在人与历史之间的重要障碍之一,它使得历史无法再现,人只能感受到语言中的历史的物质性,而无法直接看到一个物理现实的历史。德·曼指出,语言中的符号和它要表现的意义之间永远不可能重合,把这种观点用于分析文学语言,是毋庸置疑的。而事实上,文学语言不同于或者优于我们日常的语言,在于它传达的意义始于知识的远端,“是摆脱直接表达谬误的唯一语言形式”(同上:17)。这里的“直接表达谬误”指符号可以与意义直接重合。德·曼拒绝本质主义者持有的这种观点,他强调语言符号作为指称与所指物之间是不透明的关系,无法言及所指物。语言中的各种“不透明”存在,阻碍语言构成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之间的直接联系。

语言的自足性特点从根本上迟滞历史从物理现实到语言的物质过程,消解历史再现的可能性。在德·曼看来,语言本身是自足的领域,它并不直接指示实体,而是指向自身,不断自我推延,它的意义存在于语言游戏中,亦即语言的不断转义中。转义后的语言学实在与对事物的真实经历经常被混淆,其实质是意识形态运作造成的“语言和自然的实在的混淆,所指物与现象论的混淆”(同上:11)。只有去掉它们所指的具体的东西,才能把握它们。这个论点与后现代历史哲学家们的观点相近,如罗兰·巴特就将历史话语看作意识形态运作产生的效果,“经由想象性的语言,才从纯语言的实体转移到心理的或意识形态的实体上”(巴特 1988: 59-60)。

德·曼从语言的角度阐释历史的物质性,与马克思、巴赫金关于语言和意识形态的论述相比,在认识论上有一定程度上的退步,但其倡导的人作为个体和社会作为所指物之间的不确定关系,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中“现实—认知—语言”的原则有暗合之处,都将注意力聚焦于人的认知对于理解和阐释现实的作用和意义。不同的是,德·曼持有的语言论既不是经验的,也不是理想的,而是一种批判语言学的态度,“从纯粹的语言分析,进入到那些真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本质的问题”(de Man 1986: 121)。

4 审美的物质性

德·曼的学术生涯后期关注康德和黑格尔等思想家撰写的美学方面的文章,认为人在审美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种“物质视野”,这种视野“是纯

粹的物质性的,没有任何自反性的或知识性的并发症状;它也是纯粹形式的,没有任何语义上的深度,可以归约为视觉上的形式化的数学和几何图形”(同上 1996: 83)。那么,这种视野是如何表现的呢?

首先,表现为形式的物质性。在《康德的现象性与物质性》一文中,德·曼做出比较客观的分析,认为康德的审美原则“并不依赖于哲学的规则,而是一种语言学原则”(同上:78)。例如,数学的崇高是一个转义的替代体系,实际上这里不是对“绝对大”的判断,而是层次的移位、置换和替代,从很大,太大到绝对大,这个广度是想象力的界限。再者,从数学的崇高到力态的崇高,并没有一种过渡性解释,反而出现一种断裂,即从人的认知到行为,从转义到述行的断裂。例如,观看大海、天空属于转义行为,是对自然界一切大小的估量,最终都转化成为审美的行为;面临深渊险境,需要在心里先装有一些理性的理念,让我们离开感性的恐惧,转而以更高的合目的性去战胜恐惧,从而获得崇高感,这属于述行行为。

然而,康德巧妙借用“看”(seeing)的过程来弥补这个断裂,从“看”到自然界事物的物质视野,再到人内心世界对事物进行反应的现象视野,然后才是理念引导我们带着“合目的性”的理念去征服现象和物质。这种崇高不存在于自然界的任何事物之内,而是内在于我们的心理。或者说,“这些现象的直观在自身带着它们的无限性的观念”(康德 2009: 89)。德·曼认为康德所说的大海和天空,并不涉及人的思想,而是一种对于眼睛来说的冗余现象。德·曼称为“非现象”,它是先于人的感知的“物质视野”(de Man 1996: 82)。

进一步看,康德把看到的物质事实作为一种现象进行审美观照,是把物质转换为现象,同时也成为经验客体。客观事物是物质的,对人的感觉是开放的,而人对物质的经验是复杂的、不可确定的,也是不可归约的,那么现象就是各种各样的审美观照。由此可见,现象和物质并不是绝对吻合在一起的,而是某种程度的相关,因为毕竟现象总是要牵涉人的感知,“是一个绝对的形式主义,毫无所指和符号学的概念”(同上:128)。对比康德的表述,“凡是我们依照判断力的指示在直观里所能表现的,(亦即审美地表象着的)都是现象,因而也都是量”(康德 2009: 84)。“现象”与“量”分属不同的认识方式,但康德将现象和物质放在一起谈,事实上也反映出审美中物质性的存在。

其次,表现为阐释的非现象性。德·曼从语言学的角度审视康德的崇高论,认为物质视野的根本在于去发现事物的物质性本身及其构成意义的要素,而非对事物进行现象化情境描述。对于“构成”这既不是建构,也不是创造,而是陈列出对事物自然的、未经思考的、朴实的认识中混淆的意识的意指对象,旨在弄清楚处于何种逻辑层次上。

德·曼反对泛形象化(para-figural)趋势,是因为物质性是“一个必然的、具有抵制性的非现象”,而形象化会把语言现实与自然现实、指涉关系与现象论相混淆,把词与物之间的习俗关系当成现象关系,把指称效果当作现实关系,进而促成现象化的所指偏离(Cohen et al. 2012: 16)。恰如希利斯·米勒评价的那样,德·曼的阐释方法是“整个人类生活的活动场所和基础”(Miller 1987: 48)。换言之,文本的所指其实是一种非现象化的形象化过程(nonphenomenal figuration),我们需要放弃现象中包含的其他内容,恢复现象自身的模糊性,运用一种非现象化的方法看透语言与世界之间的隐喻替代机制。然而,德·曼对文学语言的过度褒奖,完全放弃对意义的确定性的追求,是不可取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德·曼用以解释语言的物质性和现实世界的方法论充分显示出他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理解,即抓住语言现象(事物的物质性存在)这一个我们可以经验地肯定的东西。但是,语言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语言现象也因此不像客观事物的存在事实那样可以为我们所经验,它的存在表现为一种语言事实。胡塞尔倡导我们要凝神于事物的具体现象,直观其本质,从人的感觉经验返回到现象。“面向现象本身”,在这里也是德·曼研究语言物质性的重要思路之一,即通过现象学还原,回到认识过程的始源和客观性,暂时拒绝各种外在的概念和理论,把所有的关注聚焦于语言现象,把语言的现象看作各种研究的前提。

5 结束语

德·曼谈及的物质性不只表现为词语的书写组合安排,还表现在历史的语言事件性和阐释的非现象性等方面,其主旨是显示出“物质性”作为一种抽象性的存在,渗透于我们的语言和生活中。德·曼在探讨物质性的时候,倾向于使用物质性、

所指性等词语,强调物质性的抽象维度,也说明这一点。与此同时,德·曼探讨的语言的物质性,也启发我们去发现语言意义构成的复杂性,消除本体论,认识人与语言、语言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德·曼关于物质性的辩证性存在成为理解他批判语言学立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意义书写与消除之间始终体现的是一种在场与不在场的辩证法,即所指和无所指的关系。

参考文献

- 海登·怀特. 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康德. 判断力判断[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罗兰·巴特. 符号学原理: 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 Benjamin, W. *Illuminations* [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7.
- Cohen, T. *Material Events: Paul de Man and the Afterlife of Theory*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 Cohen, T, Claire, C., Miller, J. H. *Theory and the Disappearing Future: On de Man, on Benjamin* [M]. London: Routledge, 2012.
- de Man, P. *Blindness and Insight*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 de Man, P. *Resistance to Theory*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 de Man, P. *Aesthetic Ideology*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 Derrida, J. *Of Grammatology* [M].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Marx, K. *The German Ideology* [M].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8.
- Miller, J. H. *The Ethics of Reading: Kant, de Man, Eliot, Trollope, James, and Benjamin*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Riffaterre, M. *Semiotics of Poetry* [M].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 Saussure, F. D.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Starobinski, J. *Words upon Words: The Anagrams of Ferdinand de Saussure* [M].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